

试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共 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张 斌

内容摘要 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政治主张是中共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情况后提出的正确的政治主张,是中共废除一党专制、坚持多党合作、实行民主政治等一贯政治主张的反映。实际上,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也是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各党派联合的、五权分离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取消了一党独裁,实行了民选的五权分离的“内阁制”,具有很强的新民主主义成分和因素。

关键词 抗战胜利前后 中国共产党 政治主张 联合政府

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中共曾就此在一些历史决议和文件中作了原则性的评价。那么,当时中共为什么要提出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中共为什么要致力坚持“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本文拟就上述论题试作探究和分析。

—

人所共知,废除一党专制,坚持多党派合作,以争取抗战胜利,是中共一贯的政治主张。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改革政治机构”,建立有各党派、各团体革命分子参加的廉洁的“国防政府”的主张,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党派在“国防政府”中能够民主地制定和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改变国民党在政府中一党专制的局面。1941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时,又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1]。

1943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再次指出:国共两党果能“推诚相见,公平合理的解决各种问题,则不仅在蒋主席领导下,合作抗日的最后结果,必然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可以在蒋主席领导下,达到合作建设之目的”^[2]。这表明,“推诚相见”、“公平合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即只要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按照有利于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关系的原则,不仅合作抗日可以在蒋介石领导之下,而且在未来

新中国,国家政权也可以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实现共同建设的目标。194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韦斯时亦进一步向他阐述了民主改革国民党政府是团结抗日和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的思想^[3]。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议上代表中共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解决时局危机的政治方案:“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5]从此,建立“联合政府”就成为中共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一面旗帜,为国统区人民指明了斗争目标。

1944年10月10日,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时,周恩来又发表著名演说《如何解决》,专门就建立“联合政府”的步骤作了具体说明,其中在“联合政府”的人选构成问题方面建议:“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5]显然,这时中共主张成立的“联合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而是以国民党为主体、各抗日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精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6]他同时指出,由于“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因而,“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就是要“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7]。并且,他还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8]进而强调,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9]。这样,中共就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从而使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臻于完善。

日本投降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继续坚持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道路。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0]10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又再次声明并一致主张要合作建国。

1946年1月,国民党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在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协会议上,通过了《政府改组案》等五项决议,继而不得不将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具体化。为此,周恩来指出:“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11]

此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积极为“联合政府”的实现不懈努力。然而,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

出尔反尔，于同年6月底发动全面内战，并在11月15日召开非法的“蒋记国大”。至此，“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12]，中共同国民党组建“联合政府”的良好愿望也最终未能实现。

纵观中共中央关于“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提出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共一贯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具体任务的不同，“联合政府”主张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几次变化：第一，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前，中共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各抗日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第二，从党的七大到日本投降以前，中共在坚持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了在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第三，从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11月伪“国大”的召开，中共不再提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而是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二

既然“联合政府”是中共在抗战前后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那么按照中共的主张和设计方略，所设想的多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怎么合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

1. 关于“联合政府”中各党派地位及否决权问题。

蒋介石历来视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为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13]。但是在政协的决议里，国民党被迫承认了“联合政府”中“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14]。因而当时中共也认为，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15]。关于否决权问题，政协决议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会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16]。这就是说，国民党虽然占有1/2的多数，但仍不能完全把持和操纵国民政府委员会，只要出席委员中有1/3者反对，便可不致轻易通过涉及施政纲领变更等方面及性质的重要议案。由此可见，尽管“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力”，但由于承认了各党派之间的平等合法地位，以及必要的否决权，故而组建这样的“联合政府”，就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推进国家政治民主化无疑是一个长足的进步。正如周恩来所说，“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17]。

2. 关于“联合政府”的构建形式问题。

根据政协决议的规定，未来的“联合政府”将以“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施行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分离建制，省市县“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现选民自下而上之普选”，“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曰国民大会”。显而易见，如果遵循这些原则，未来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内阁制”、“国会制”、“省自治制”的国家。同时也表明“联合政府”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基本满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

3. 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权性质问题。

按照中共当时的设想，一方面，由于“联合政府”的主体和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并且在国家

制度上采取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这说明它还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又由于“联合政府”中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参加领导,以及允许边区政府的合法性,“实行地方自治制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18]。所以,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又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有很强的新民主主义成份和因素。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按照中共的主张和设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内容不仅包括战时合作抗日,也包括战后合作建国。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时就曾非常鲜明地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在于现在及将来“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19]。既然是合作建国,而且还是在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和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的情况下,那么显然当时中共在政权上所能采取的首要策略和最高形式,莫过于运用改革的手段,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府改造为各党派联盟组建的民主政权即“联合政府”。正因为如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20],是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

三

综上所述,中共所主张建立的“联合政府”不仅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而且和中共“七大”所阐述的战后建立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也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共还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他能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21]。即便如此,中共仍然一如既往地和广大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一道,义无反顾地朝着“联合政府”的目标勇往直前。

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当时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急速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渴望消弭内战,休养生息,迫切希望通过和平道路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一时间,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国际上,美国推行“遏制扩张”的全球扩张战略,妄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受美国操纵的统一稳定的“强国”,但它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22]。于是,美国执意上演双簧戏,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争端,并于 1945 年 12 月 15 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把把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23]而且当时苏联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也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避免内战。因此,中共认识到:“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24]

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25],一时难以完成内战部署。同时,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力量的

强大,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的情绪激昂,国际上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这就使国民党政府“不能不有很多顾忌”,“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26]。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并表示要“共同戮力,从事建设”,“以建国之功收抗日之果”^[27]。种种迹象表明,建立“联合政府”有某种可能,尤其是政协决议的通过,使“联合政府”的成立有了进一步的可能。

正是基于对时局形势的这一把握,即使在全面抗战爆发而国共两党谈判尚未破裂的时间里,中共仍然高擎“联合政府”的大旗,并为之付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正如1946年1月周恩来在政协闭幕会上所说:“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距离”,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28]。“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29],同时“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30]。因此,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与国统区的旧民主主义并存的局面下,就可以把建立“联合政府”作为走向新民主主义的起点,通过牢固争取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广泛开展“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31],逐步排除资产阶级的领导,进而和平地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毫无疑问,中共主张建立这样的“联合政府”绝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它亦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不违背。正如1947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今天是不同的,今天要用武力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两个方法不同,是不是有一个对,有一个不对?”“我们答复:现在对,过去也对。”^[32]

注释

[1][6][7][8][9][25][2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33页、957页、968页、969—970页、966页、1051页、1056页。

[2]《解放日报》1943年3月14日。

[3]《亚美文件:中国大变动的线索》,789页。

[4][5][15][16]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九),438页、461页、462页、461页。

[10][23][3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十),38页、83页、116页。

[11][12][13][14][17][20][21][24][30][32]《周恩来选集》(上),256页、244页、205页、253页、261页、190页、205—206页、273页、261页、272—273页。

[1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632页。

[19]《毛泽东军事文选》,108页。

[22]《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

[27]《新华日报》1945年8月16日、21日。

[28][29]《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2日。